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巴渝文脉 源远流长

常碧罗 姚 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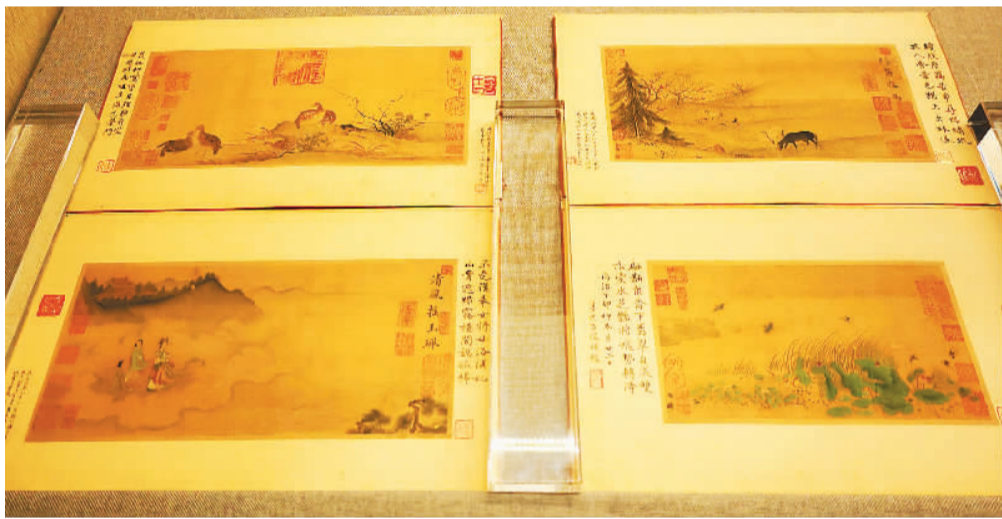
走进重庆渝中半岛，长江、嘉陵江在此交汇，如月牙般环抱。跨江眺望，人民大礼堂、人民广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矗立于主轴线上，组成城市标志性建筑群。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院。2000年，为承担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大量文物抢救、展示和研究工作，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2005年新馆正式开放，2008年入选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由主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宋庆龄纪念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和涂山窑遗址5个场馆组成，馆藏文物11.6万件/套、古籍善本2万余册。主馆常设壮丽三峡、远古巴渝、重庆城市之路、抗战岁月、巴蜀汉代雕塑艺术、历代瓷器、历代书画、历代钱币等展览。作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博物馆年均服务观众超300万人次。

青铜重器，诉说神秘巴国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乌杨阙。阙是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具有象征意义的楼观建筑，常左右成对。这对东汉石阙出土于重庆忠县乌杨镇将军村，造型挺拔巍峨，阙身及楼部雕刻有青龙、白虎、凤鸟等纹饰，是目前重庆和川东地区唯一保留有子阙的石阙。



南宋《杂景院画》(部分)。

李聪冲摄

在博物馆一楼的远古巴渝展厅，可以看到著名的“巫山人”左下颌骨化石。这块化石1985年出土于巫山龙骨坡遗址，年代为距今200万年左右，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为探索东亚地区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巴国是巴渝地区的一个神秘古国。据文献记载，巴人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因功封爵，成为周朝的藩国。学者们推测这时的巴人居住在鄂西地区或江汉平原上。春秋时期，巴国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失败，被迫向三峡地区撤退，建立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巴国。巴人在学习外来先进青铜文化和自行探索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了数量众多的巴国青铜器，战国虎钮铜罍便是其中的珍品。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同年这件宝贝在万县地区甘宁乡（今重庆万州区甘宁镇）出土，可以说，它和我在博物馆的‘工龄’是一样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研究员彭学斌笑着说。

“这件罍是在水坝泄洪时被发现的，当地人一度认为它与三国时期东吴大将甘宁有关，但经过考证，发现它比甘宁还要大几百岁，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重器。”彭学斌介绍，罍于为古代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尤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堪称巴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青铜乐器。

此罍于重约30公斤，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盘内虎钮周围分布着五组纹饰，分别为：椎髻人面纹、羽人击鼓与独木舟纹、鱼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叶纹。“它造型厚重，音质优良，有‘罍于王’之美誉。”彭学斌说，虎形钮是巴人崇拜的例证，虎钮周围的纹饰也带有巴文化的特征，其中的羽人击鼓与独木舟纹被选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墙浮雕的中心图案。

战国鸟形铜尊也是一件颇具特色的青铜器。它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地，整体呈鸟形，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鹤身、鸭脚等特征，通体饰细密的羽纹，专家判断羽纹上原来嵌有绿松石，可惜早已脱落。青铜尊本是酒器，这件尊除了鱼形嘴之外，器身上却没有灌酒的孔，不具备容器的实用性，应系学习中原地区鸟尊的形制而作。此器造型、纹饰十分精美，铸造难度很高，是体现巴人审美情趣和工艺水平的精品。



战国虎钮铜罍于(局部)。

动脉摄影

石碑题刻，见证三峡变迁

长江三峡是远古地质运动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三峡由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组成，西起重庆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全长193公里。自古以来，三峡地区留下了绚烂多彩的历史文化遗迹、神话传说和瑰丽诗篇，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盛景。



南宋《杂景院画》(部分)。

走进壮丽三峡展厅，一块古朴的石碑吸引了记者注意。“这是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且品相极佳，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刘兴亮介绍，这块碑出土于三峡库区云阳县旧县坪遗址，是东汉胸忍（今云阳）令雍陟于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为纪念70年前的胸忍令景云而立。碑文共有367字，记述了景云祖先的迁徙史、三峡腹地的故事、景云的政绩等。“景云碑记录了三峡地区的政治、地理、移民等史实，而且书法美、雕刻精，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刘兴亮说。

三峡地区留存着众多水下题刻，为长江水利、航运提供了可靠的水文资料，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位于重庆涪陵区长江北江心的白鹤梁，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美誉。白鹤梁现存的165段题刻，记录了自唐广德元年（763年）以来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信息，并反映了当地气候、人文和社会生活情况。白鹤梁上还有黄庭坚、朱熹、庞公孙、朱昂、王士禛等文人墨客的诗文题刻，弥足珍贵。

“白鹤梁常年淹没于江水中，仅在冬春枯水季露出水面，有的题刻甚至几十年才露面一次。如今在博物馆中，人们就能见到白鹤梁题刻的真貌。”刘兴亮告诉记者，展厅里展示的题刻石块，是从白鹤梁上掉落下来的。

2018年，刘兴亮主持了重庆江津区莲花石题刻的拓片工作。“莲花石上的题刻记录了南宋乾道中期至1937年近800年间的长江枯水水位情况，是国家水文资料。”刘兴亮介绍，历史上莲花石可考证的出水次数仅有17次，1987年与2007年石刻曾两次出水，惟拓工作主要是在1987年进行，但所获甚少。“2018年莲花石再度出水，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团队中有的老师从事文物保护几十年，竟也是第一次接触题刻原石。”刘兴亮带领团队在48小时内抢拓出10张精品拓片，为难得一见的题刻留下了宝贵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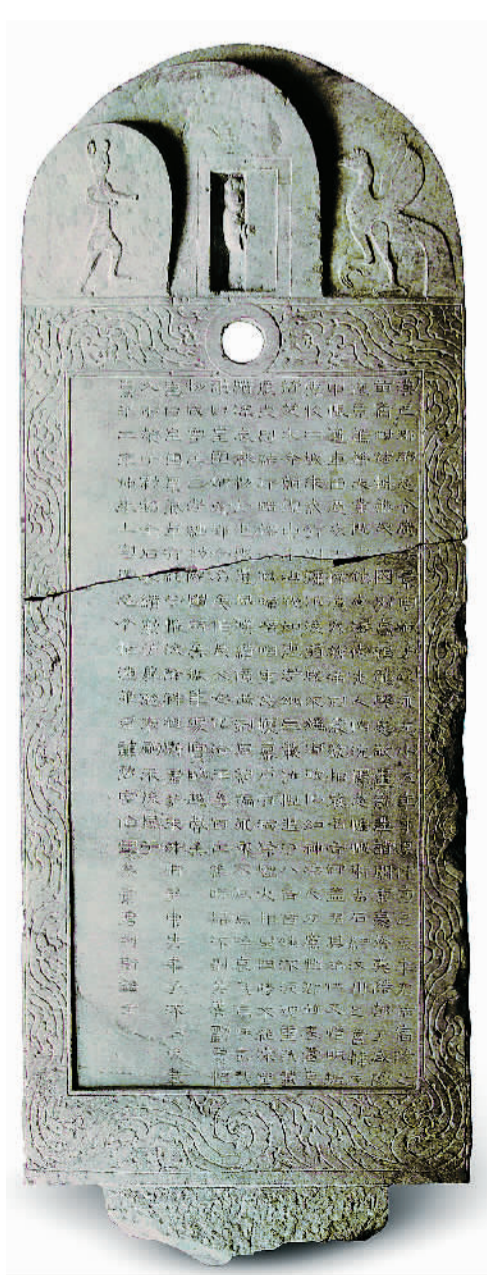
书画古琴，记录艺坛风雅

拾级而上，来到四楼，“百川汇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精品书画展”吸引了不少观众入场参观。展览汇集了70余件/套馆藏书画精品，其中不乏夏昶、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名家作品，而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南宋《杂景院画》。

“第一次见到馆里收藏的《杂景院画》时，我瞬间被吸引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江浩说，这本画册是南宋时期马麟、林椿等7位宫廷画家的作品，共有8开，其中3开钤有“御府图书”印，表明此册曾为南宋宫廷收藏。全册小巧精致，色彩绚丽，其中林椿所作折枝花一幅，角度细微、构图精巧，充分体现了南宋院画的艺术风格。宋代绘画流传下来的极为稀少，此册不仅保存完好，色彩如新，更是南宋宫廷名手绘制，并有南宋宁宗皇后杨妹子题字，足见其在当时亦为皇室所重之珍品。

“我馆还藏有齐白石四季山水屏，被誉为齐白石山水最佳作。此屏还见证了一段艺坛趣事。”江浩介绍，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提到“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这个“姓王的军人”，正是重庆巴蜀中学的创始人、抗日名将王缙绪。1932年7月，齐白石将自己创作的十二条山水屏赠予王缙绪，其中一幅为《梦游渝城》，描绘了画家想象中的渝城风景。如此精心细作的大尺幅十二条屏，在齐白石传世山水中至为罕见，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的经典佳作。1951年，王缙绪将这组画屏捐赠给西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

古琴也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特色收藏，不论数量还是品质都在全国博物馆名列前茅。不久前，“松石间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古琴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幕。展出的20余张古琴中，北宋“松石间意”琴最为珍贵。此琴为仲尼式琴，通体黑漆，琴身上有苏轼、唐寅、文徵明等十多位宋、明、清书画名家的题字或诗，是目前所见题识人数最多的古琴，反映了古代文人的风雅意趣。



东汉巴郡胸忍令景云石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文物数量多、制作精、造型奇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丰富

本报记者 王明峰

9月9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向公众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阶段性重要考古成果。

今年3月，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揭开神秘面纱，引起广泛关注。时隔5个多月，6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又有了重要进展。在已经发掘结束的4号坑、基本清理结束的3号坑和暴露出埋藏文物的7号、8号坑，发现了体形巨大的青铜祭坛、神兽、完整的金面具、刻有神树纹的玉琮以及形似餐刀的玉刀、“撞脸”奥特曼的青铜人像等文物。新发现文物数量之丰、制作之精、造型之奇，让人叹为观止。

铜人像等器物前所未见

据介绍，3号坑出土各类器物残件和标本共729件，其中较完整遗物478件（组），主要有铜器、玉器、象牙、金器、海贝等。3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由上半部分铜尊与下半部分人像组合而成。铜顶坛人像、神树纹玉琮等器物，题材独特、细节丰富，均前所未见，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4号坑遗物已全部提取完毕，共出土完整器79件、残件1073件。完整器包括玉器、铜器、象牙、陶器等。4号坑出土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大小、造型一致，似同属一件铜器。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颌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明显的负重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说，这3件人像从造型、纹饰等方面来看都是三星堆考古全新的发现，为研究三星堆青铜铸造技术及艺术、宗教信仰与社会体系、三星堆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材料。

经过碳十四年代研究，可判断4号坑埋藏年代大概在距今3148—2966年，属商代晚期。3号坑与2号坑同属一组，年代与2号坑非常接近，大致为晚商时期（约当殷墟二期）。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多学科研究与文物保护稳步开展。考古人员在3号坑青铜大面具等器物上发现了纺织品残留。在4号坑灰层一件青铜器旁发现了一缕有序排列的麻线，但这麻线并不存在经纬组织结构。考古人员随后对其他土样做了进一步的显微观察，发现了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其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这是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丝绸残留物。

发现最大完整金面具

继三星堆5号坑发现体量巨大的金面具后，3号坑再度发现金面具。

3号坑坑长、上海大学徐斐宏介绍，这件金面具是今年端午节时发现的。“当时我们提取一件青铜器残片后，发现下面隐现金色，这意味着下面应该有金器。”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揉得皱巴巴的金面具露出泥土。金面具展开复原后，宽约40厘米，高约27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完整金面具中体形最大的一件。

早在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戴金面罩人头像等文物就反映出独特的用金习俗。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开启以来，金器频频出现。3号坑出土了十多件金器，5号坑发现了金面具和散落满地的金箔片，8号坑也发现了360多件金箔器。它们被做成鱼形等不同形状，上有穿孔，可以挂在神树上作为装饰；有的可以贴在容器或宗教器物表面；有的还雕刻了精美的云纹或勾云纹纹饰。

8号坑也发现一件残缺的金面具。“结合三星堆曾经出土的戴金面罩人头像来看，这些金面具应该同样是覆盖在青铜头像上作装饰之用的。”徐斐宏说。

8座坑可分为两类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认为，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8座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这两类坑呈现出几个方面的明显不同。

“首先是年代和层位关系不同，6号、7号坑存在明显的打破关系——6号坑打破了7号坑，说明6号坑出现的时间比7号坑晚。其次是形制特征和尺寸不同，5号、6号坑的面积都较小，不超过5平方米，深度为1米左右；其余6座坑则超过8平方米，深度在1.6米左右，有的甚至可以达到2米。”

8座坑的出土文物也存在一些不同。冉宏林说，5号坑除了大黄金面具之外，主要是细碎的金器、玉石器、青铜器、象牙雕等；6号坑中除了木匣和玉刀等少数几件文物，暂时没有更多器物发现。“其余6座坑则充分展示了古蜀国的富丽繁华：完整的象牙、大型的各类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等层层叠叠、密密麻麻……”

这两类坑的文物埋藏方式也有所不同。一类像是有意地、虔诚地摆放进去，比如6号坑中与坑同长的木匣，摆放得很规整；但另一类坑中的器物，更像是直接抛进去或倾倒进去的。

冉宏林说，5号、6号坑整体来看似乎年代较晚，另外6座坑则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我们在不同的坑中多次发现了可能属于同一件器物的不同部位。”8号坑的青铜神兽颈部缠绕了一圈铜丝，3号坑中造型奇特的铜顶坛人像下方底座也缠绕着一根相似的铜丝。此外，3号坑新提取出的一件青铜神树，也与1986年发现的2号神树树枝形状一致，且长度一致。



铜扭头跪坐人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